

理性与艺术外交大师

周恩来

● 李宏 著



人民出版社

理性与艺术外交大师

—— 周恩来

● 李宏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王能雄

装帧设计:徐 晖

版式设计:朱启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性与艺术外交大师——周恩来/李宏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7

ISBN 7-01-003197-5

I. 理…

II. 李…

III. 周恩来-生平事迹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9958 号

理性与艺术外交大师——周恩来

LIXING YU YISHU WAIJIAO DASHI

——ZHOU ENLAI

李 宏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1.75

字数:252 千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7-01-003197-5/D·901 定价:18.00 元

序

周恩来同志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军事家，而且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外交家。新中国成立前，他是中共中央外事方面的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兼第一任外交部长，直接领导外交工作长达 26 年之久。他在我国的外交战线上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开创性工作，为我国赢得了极高的国际地位和威望。他是新中国外交的创始人和奠基者之一，是新中国外交战线的一代楷模，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声誉。他的外交思想、外交实践以及他所倡导和体现的新中国外交风格，是国内外研究周恩来生平事迹及其思想的专业人员和学者所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系统地阐释、总结和研究周恩来同志的外交思想与实践，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笔者现据搜集的资料对此问题研究的基本情况作如下述评。

—

周恩来的名字很早就广为国内外人们所了解，经过新中国成立以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周恩来已作为新中国的代表和象征广为世界各国所承认。而最早将周恩来介绍到国外的，是西方记者埃德加·斯诺。1936 年 6 月，斯诺历尽艰辛来到陕北革命

根据地中心保安进行采访。通过这次采访，他编写了一部轰动世界的著作即《西行漫记》。在这部书中，斯诺用大量篇幅描述了周恩来，介绍了他的革命历程，包括他的外交活动。斯诺之后，又有许多外国记者到延安考察，采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他们跟斯诺一样以记者身份向世界报道中共红区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袖。在当时和后来写成的著作、回忆录中，他们介绍了周恩来对他们的接待和他们对周恩来的印象。

1937年后，周恩来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地区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与外国记者及驻华外交官员经常交往。他们写了许多回忆文章和著作，回忆了周恩来当时的外事活动。如美国前外交官谢伟思的《回忆周恩来》、《胸怀全球 功业盖世》，美国前外交官修斯多夫的《回忆延安时代的周恩来》，美国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在华五十年》，美国国务院1949年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即《白皮书》）等对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活动均有记述和一定的看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地位的提高，作用的增大，国外开始重视研究中国问题和中国领导人。对周恩来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的研究，成为他们研究中国问题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对周恩来外交言论和外交活动的研究，来认识国际局势和分析中国外交的动向，从而为各国自身的内政、外交政策服务。

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世界各国的新闻媒介都做了最广泛的报道。1978年出版的《五洲的怀念》一书，收录了一些国家、政党的领导人，一些团体、著名人士的唁电、声明、评论文章、回忆怀念文章、诗歌等200多篇。尽管该书收入的材料很不完全，但

是从这些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地位、不同政治观点的人士对周恩来的崇敬、怀念和评价中,可以看到周恩来的外交才干,在建立新的国际关系上的重要作用和在全世界所享有的崇高威望。

日本、美国、英国等国家和港台地区还出版周恩来传记,涉及到周恩来的回忆录等。这些传记和回忆录为我们提供了作为外交家周恩来的生动材料。

1987年,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罗纳德,经过数年的潜心研究推出了《周恩来的外交》专著。这本书系统地介绍了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及其风格。作者综观周恩来的整个一生,认为周的外交思想和风格的形成可追溯到他年轻留学欧洲期间对当时国际局势及中国和远东事务的关注;他的战时重庆生涯促成并磨砺了他的外交风格和才华,也奠定了他的外交思想基础,尤其是他的“统一战线”思想;新中国成立后的直接外交实践更使他的外交才智大放光彩,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作者还对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来源、体现出的精神及其在实践中的作用,都进行了研究。这本书是当今国外研究周恩来的外交的代表性著作^①。

国外对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的介绍和研究,对我们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当然,由于研究角度、掌握和选择材料、特别是指导思想体系的不同,国外一些作者的观点以及他们对史实的理解,是不妥的。

同国外相比,国内对周恩来的研究起步较晚。周恩来在世时囿于各种各样的条件和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对于学术界来说,

^① 《周恩来的外交生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很少想过,更谈不上对他的外交思想与实践的研究了。

周恩来逝世以后,周恩来研究作为一个新的学术领域受到国内学术界的极大重视。1976年,特别是1978年以后,对周恩来在各个时期和各个方面的研究逐步地广泛开展起来。有关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研究的文章,也在报刊上陆续发表。如:胡华、林代昭《胸怀世界革命全局的国际主义战士——学习周恩来同志旅欧期间关于国际形势的精辟论述》(1978年),王炳南《回忆周总理在外交工作中的几个片断》(1979年),邵国康《周恩来对亚洲不结盟国家的外交态度,1953—1960》(1979年),马列、王凝《周恩来同志所倡导和体现的新中国外交风格》(1981年),高晶《周恩来总理与战后中日关系正常化——纪念周总理逝世八周年》(1984年),张载伦《正确处理自力更生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学习〈周恩来选集〉下卷》(1985年),孙连成《倡导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学习〈周恩来选集〉下卷》(1985年),李金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辟了世界和平的道路——学习〈周恩来选集〉下卷》(1985年),易仲书《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走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学习〈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体会》(1985年),陈国锋、唐建宇《要正确处理自力更生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学习〈周恩来选集〉下卷的一点体会》(1985年),陈瑾《周恩来同志在外交工作中的领导风格》(1987年),高梁《周恩来在抗战期间开辟对外宣传工作的光辉事迹》(1987年),刘学良《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对国际统一战线的巨大贡献》(1988年),刘宁一《周恩来与建国前的人民外交》(1988年),魏史言《周恩来的外交思想》(1988年),李玖《周恩来对国际法发展的重要贡献》(1988年)等。据不完全统计,1978—1988年10年间,国内发表学术论

文中涉及到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的论文不到 20 篇,可见,这一时期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的研究还很薄弱。

1988 年 3 月 5 日,在纪念周恩来诞辰 90 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性的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这标志着全国范围内的周恩来研究局面已经形成。10 月,第一次国际性的研究周恩来的学术研讨会在天津举行。这次大会把中国国内的研究与国外的研究沟通起来,使这两方面的研究互相促进,从而把周恩来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提交两次会议的 156 篇论文中,有近 10 篇是关于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研究方面的论文。有些收入两次会议编辑的论文集中。如:吴瑞章、王永钦《周恩来在建国前的外交思想和实践》,马芷荪《周恩来与抗战时期中共的对美政策》,章文晋《周恩来与马歇尔使华》,裴坚章《关于周恩来外交思想研究的几个问题》,魏史言《周恩来的外交风格初探》等。

1989 年 3 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主办的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研讨会,则把这项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研讨会收到 50 余篇论文,并编辑出版了周恩来研究中的一部专题性的论文集《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内容涉及到了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的所有主要方面,对周恩来总体外交的基本特征和影响、外交政策思想、外交风格、外交谈判艺术以及在侨务工作、外交礼宾、外事调研、外交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具体主张与实践都有论述;对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解决中缅边界问题、开展非洲和中东外交、处理社会主义国家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间关系等方面,也给予了充分的注意和研讨。可以说,这本书是近年来关于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学术研究

成果的最全面的概括和较深刻的总结。

随后,1990年5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周恩来外交文选》。该书收入了周恩来1949年至1975年关于外交问题的文章、讲话、谈话、答记者问等共80篇。《周恩来外交文选》真实地反映了周恩来杰出的外交实践和理论,为学术界研究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与实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促进了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研究的深入发展。

1993年3月,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这部由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录的《大事记》记载了周恩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外交活动6000余次。内容全面、翔实,有较高的资料价值。1993年3月,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分别和浙江、江苏召开纪念周恩来诞辰95周年研讨会。会后于1994年2月、4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业绩·方略·情怀》和《风范·思想·乡情》两本论文集。在这两本论文集中收录了6篇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方面的论文,还收录了一篇国外对周恩来外交思想的研究述评论文。这些新的成果深化了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的研究,反映了近几年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研究的新的进展。

1998年,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前后,从中央到地方举行了一系列纪念会和学术研讨会。党中央召开了周恩来一百周年诞辰纪念大会,江泽民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他高度地评价了周恩来的一生以及他在各个时期和各个方面的贡献。天津举办了第二届国际周恩来学术研讨会,与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以“20世纪与周恩来”为主题,展开了广泛和深入的研讨。一批研究周恩来的专著、论文问世。1997年10月,中央党校出版社

出版的裴默农所著《周恩来外交学》，填补了一个空白。1998年2月，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编写的《周恩来大辞典》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约215万字。2791个条目（不包括附录编）。《大辞典》在学术上，基本反映了目前周恩来研究所达到的水平。这些成果标志着周恩来研究在系统化、科学化、理论化方面，又迈上了新的高度。

以上关于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研究的简要情况表明：第一，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研究已经在国际和国内形成局面，一批回忆录、研究资料、研究论文和研究专著相继问世，包括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研究在内的国际、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已召开，特别是外交部举办的高层次的专题研讨会，则把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形成了一支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的队伍，同时，在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研究领域，也涌现出了一批专家和学者。第二，同国外相比，同国内周恩来研究中某些专题的研究相比，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的研究起步较晚，投入的力量还比较弱，开创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研究新局面，把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研究推向新的高潮，还缺少有组织的引导。第三，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研究在周恩来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随着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建立，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国际交往的扩大，对举世公认的杰出外交家周恩来的研究，必将会有广阔的前景。

二

周恩来丰富多彩的外交实践，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之一。

1. 周恩来外交生涯起始时间

学术界认为,周恩来成为新中国和世界上杰出的外交家不是偶然的,而是与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做了大量的富有成效的外事工作并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分不开的。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工作大部分属于国民外交,周恩来正是国民外交积极的倡导者和组织者^①。国外学者对周恩来这一时期的外交工作实践做了较多的研究。但是对周恩来外交生涯的起始时间却有不同的认识。

多数学者认为,周恩来外交生涯的起点在30年代中期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时期。前苏联学者沃洛霍娃在她的《周恩来与中国外交》论文中指出:周恩来在处理西安事变,推动国共两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并显露出卓越的外交才能;在这以后又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如1937年在武汉建立了中共领导的一个重要的外交机构——国际宣传小组,与外国新闻记者保持联系;抗战期间代表中共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斗争,并广泛接触外国的外交人员。正是在这一时期,周恩来的主要外交方法——不拘形式团结各种社会政治力量、推行“人民外交”——最终成型^②。

加拿大学者罗纳德等人认为,20年代的周恩来已在承担中共与外部联络、调解的使命,但这些活动的外交性质还不够明确。1924年周恩来从欧洲回国后“不得不去着手处理第一次统一战线中所发生的各种复杂事件。周承担了共产国际与中国共

^① 《周恩来研究概览》,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8页。

^② 《业绩·方略·情怀》,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页。

产党相互间关系的许多重担。在对中国共产党内各派及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各派之间不断进行的调解中，他表现出了自己的谈判技巧。”^①

美籍华人学者张大卫在他的《中流砥柱各有千秋——周恩来与邓小平》一书中指出：在“1931年与毛泽东联系之前，他已代表中共驻莫斯科第三国际总部”。周恩来代表中共进行外交活动始于30年代中期，1936年的西安事变标志着“统一战线外交的出现”，在武汉建立的国际宣传部门则“打破了国民党对外交事务的垄断局面”。到40年代，周恩来实际上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外交家。

2. 1944年中共已形成半独立外交

有专文探讨抗战时期周恩来的对美外交工作，以及他在制定对美政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英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迪克·威尔逊在他的《周恩来传》中指出：抗战胜利后虽然内战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但周同国民党、美国人的谈判是无懈可击的。有的学者深入研究了1945年底至1946年，周恩来代表中共与国民党和美国代表马歇尔之间的谈判，对这场斗争的意义给予高度的评价。周恩来民主革命时期的外交工作实践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而为开展新中国外交工作做好了必要准备。

3. 1949年周恩来的外交生涯登上了世界舞台

新中国成立前夕和初期，周恩来与毛泽东一起致力于新中国外交基本政策和方针的制订。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以决策

^① 《周恩来外交生涯》，第13页。

者、指挥者、实践者的身份,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最全面、最杰出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的重大对外行动,都是周恩来亲自实践或直接指挥的^①。海外学者认为,周恩来一生功绩的杰出表现在于外交^②。美籍华人许芥昱在他的《周恩来传》中指出:周恩来以丰富的经验策划红色中国的外交路线,即使在1958年把外交部长职务交给陈毅后他仍然担负这项工作。在国内外进行一切重要谈判时还是他担任中国的主要代表。差不多一切外交旅行都由他亲自去做,即使外交部长陈毅和他一道,也是在他影子之下^③。

有学者指出,朝鲜停战后,周恩来敏锐地抓住国际局势相对缓和的时机,经中央决策,大力推进并发展和平外交政策,打开了我国外交的新局面。他提出与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上,他运用这些原则,为和平解决印支问题和促进亚非团结作出了历史性贡献^④。周恩来亲自领导解决了中缅边界问题,赢得了周边邻国的信任,使我国同大部分邻国的边界问题及其他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先后获得公平合理的解决,实现了睦邻友好。1956年底到1964年初,周恩来三度出访亚非28国,支持它们争取与维护政治、经济独立的斗争,建立与发展同它们的友好合作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学术界认为,周恩来第一次明确地声明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应建立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是在1956年11月。在此之

① 《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②③ 《中外学者论周恩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74页。

④ 《五洲的怀念》,新华出版社1978年版,第324、327、328页。

前,他也非正式地表达了这一思想^①。周恩来为维护中苏关系作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他一方面耐心做工作,力求维护团结的大局,另一方面同苏联干涉、控制我国的图谋进行坚决的斗争,显示了彻底的独立自主立场。

周恩来还积极寻求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与发展关系的途径。他把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关系与扩大和平中立地区的任务联系起来,把支持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与在欧洲资本主义地带扩大和平趋势统一起来,根据各国不同的态度区别对待,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并取得了重大突破和成绩^②。对日本,他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国民外交。对英国,他在日内瓦会议后促成了两国间代办级的半建交关系。他同戴高乐特使富尔进行长时间的深入会谈,于1964年初实现了中法建交,打开了我国同西方大国建交的突破口。周恩来是打开中美关系的战略决策的主要参与者和直接实行者。在他直接领导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对以后打开中美关系起了积极的作用。

学术界认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外交工作一度受到“左”倾思潮的严重干扰,周恩来在处境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外事领域内的“左”倾逆流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在他的领导下,外交工作从1968年就逐渐恢复了正常^③。70年代初,周恩来为开创中日、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新阶段起到了别人所难以替代的关键性的作用。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提高,世界

①② 《周恩来研究概览》,第50页。

③ 《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第3页。

上掀起了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新高潮,到周恩来逝世前,与我国建交的国家由49个猛增到107个^①。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也得到了恢复,广大亚非拉国家把中国视作他们真正的朋友,在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同我们并肩战斗,这一切是同周恩来的外交实践分不开的。

以上表明:第一,学术界对周恩来外交实践的方方面面,都做了大量的、比较详细和比较深入的研究。对周恩来外交实践所取得的成就,周恩来的外交才干和外交影响,学术界的评价也比较充分和比较客观。周恩来的外交实践可说是新中国外交史的缩影,周恩来是当之无愧的新中国外交的创始人、奠基者之一的观点,是中肯的。第二,因受现有公开资料的制约,国外学者对周恩来外交实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中国成立前。在第一手资料普遍缺乏的情况下,他们以不同的价值观念,撷集现有的文字材料,访谈记录甚至社会传闻,进行分析、比较和推断,其中既有真知灼见,亦有臆测失实之处。在国外周恩来研究中还存在记述浮泛和论证主观化的现象,以及缺少“实证研究”,实用性色彩较浓的特点。第三,对周恩来外交实践的研究,目前正从搜集、整理材料,作初步分析概括的阶段,向更高的阶段,即更加科学地搜集、整理周恩来外交实践的材料,进一步分析和概括周恩来外交实践的阶段发展。

^① 《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第3页。

三

周恩来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娴熟精湛的外交艺术和坦诚高尚的外交风格,是学术界集中研究的问题。

1. “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概括

学术界认为,“周恩来外交思想”这一提法是能成立的。那种仿佛新中国的外交思想及其战略均出自毛泽东本人,而周恩来仅仅是“执行者”、“组织者”和“实践家”的说法,与实际情况不符合^①。周恩来不仅有自己的外交思想,而且是全面、系统,富于创见,别具特色的。周恩来外交思想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两位领导人的外交思想在总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因出身、经历、文化背景、所处地位不尽相同,因而,自然存在差异。在外交决策和实践中,在正常情况下,例如50年代,两位领导人通常是相互补益的,而处于承上启下地位的周恩来,其思想自然得到了相当充分的发挥和实现;在另一种情况下,例如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在他的外交思想和实践受到制约、得不到应有发挥的情况下,他还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极“左”思潮及其表现,努力平抑或待机加以纠正,以使外交工作少受其害^②。国外学者认为,周恩来的统战思想来源于30至40年代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③。1949年后,这种思想原则为新中国的外交提供了“理性”的基础。无论周恩

①② 《中外学者论周恩来》,第390页。

③ 《业绩·方略·情怀》,第147页。

来的革命外交思想,还是其现实主义的策略方针,都是他和毛泽东共同的精神财富。“意识形态并不只是一块‘面纱’,它是周恩来‘工作作风’的智慧源泉”。即使在周恩来与毛泽东有分歧时,周也在“理论上忠实地支持毛,而在实践中却巧妙地修正毛的激进思想”。前苏联学者不同意西方学者把周在中美缓和起的作用说成是由于周自幼有亲西方倾向的观点,而认为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以巨大的破坏而急需外援。

2. 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本质

学术界认为,周恩来善于以自身的知识和实践为体,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历史上和外国的经验教训、领导和群众的集体智慧以及现存国际关系理论中一切进步与合理的因素吸收过来,熔为一炉,经过科学的加工和改造,形成了一整套既集各家之长而又有创新、发展的思想。这一外交思想的本质是社会主义的,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中国特点,而风格则完全是周恩来的^①。

3. 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来源

国外学者普遍认为,周恩来外交思想可从中国传统文化和他早年家庭生活经历中找到根源,这些背景使他善于协调由于不同意见而造成的冲突,还造就了他深谋远虑、自我克制的性格。周恩来早年接受过西方式教育,还赴日本、欧洲求学,对外部世界有着广博的知识和认真的研究,这是他外交思想的又一个来源。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来源是多方面的,但马列主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②。周恩来在国际问题上的观点,来源于马列主义关于

① 《中外学者论周恩来》,第391页。

② 《业绩·方略·情怀》,第147页。